

从对抗到合流：冷战初期英日关系 演变中的中国因素(1947-1957)

吴博皓

【摘要】在1950年代中期,英日两国逐渐改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经贸问题上的对抗态势,并就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共同利益展开了深入合作。本文指出,新中国的崛起对当时英日两国从对抗走向合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英日两国的合作既存在对华遏制战略的考虑,也存在对华贸易上的共同利益。通过揭示中国在冷战初期英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多元的角色,本文展现了冷战中同阵营国家由于外部因素,既合作又对抗的复杂图景。

【关键词】英日关系;冷战史;外交史;东南亚

【作者简介】吴博皓,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4.2.33~44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50年代早期,英国对其冷战盟友日本展现了相当消极的态度。相比于美日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紧密合作,英日两国在经贸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对抗态势。从英联邦国家联合抵制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到英国工商界要求政府抵制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都足见冷战早期两国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冲突。然而,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英日两国之间也出现了寻求外交合作、减少冲突的动向。这一期间,两国不仅在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技术输出以及遏制本地共产主义运动等方向上开展合作,同时也在对美外交上密切协调,并最终促使美国在对华禁运问题上妥协。^①可以说,英国与日本在战后的外交互动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化过程。

对于英日两国在1950年代早期由对抗到合作的转化,目前英美及日本学界主要从两国在东南亚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以及两国逐渐解决由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导致的英镑危机入手来进行研究。对于前者,现有研究往往将英日合作归因于两国在对抗共产主义扩张上的共同利益。如部分学者论证了英国

为了维护本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影响力,而选择与日本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美外交斡旋,从而打消了其对重新武装日本的疑虑。^②对于后者的研究,学界则着眼于英日两国在1950-1953年间,由于日本通过对东南亚英镑圈的贸易,积累了大量英镑外汇而导致的英镑支付危机。此类研究主要从金融关系角度出发,阐述日本如何在美国的支持下,最终迫使英国妥协,签订相对有利于自身的英镑支付协议。^③然而,这两类研究或是专注于研究英日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或是阐释西方阵营内部的多边外交,而并未详细考察两国外交决策过程中阵营外国家所施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地缘政治实体,尤其值得关注。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提升的国际威望,通过万隆会议在东南亚地区取得的外交突破,以及对东南亚地区广大华侨的吸引力,都对英日两国这一时期的外交互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于以上观察,本文将对1950年代早期,英日外交中的中国因素进行考察,并试图还原这一时期英日外交中两国各自的决策过程。通过对英日美三国

近年来解密的外交档案的分析,本文将阐明在1950年代早期,中国因素在英日关系中对双方决策产生的影响,以及两国的决策者如何通过对外政策上的协调,来帮助两国扩展合作空间,并最终走向合作。

本文将在第一部分探讨英日两国在东南亚经贸利益上的冲突以及这一时期两国的外交交锋。第二部分则主要分析英国在1952年麦克唐纳德访日后,对日外交转向缓和这一决策背后的各种因素,包括英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担忧,以及防止日本在对华问题上选择中立化的考量。同时,本文也试图指出,英日两国的合作中既存在对华遏制战略的考虑,也存在对华贸易上的共同利益。第三部分将详述英日两国在对华贸易上的默契和在具体事务上的合作,以及两国在挑战美国对华贸易封锁上的外交协调。本文希望通过揭示中国作为非西方阵营国家,在冷战早期英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多元角色,展现亚洲冷战中,不同阵营间在意识形态对抗之外既合作又对抗的复杂图景。

一、英日两国在东南亚贸易问题上的对抗(1947-1952)

在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前期,日本国民经济在美国扶持下逐渐恢复,日本产业界对出口市场的需求随之成为英日两国之间最突出的矛盾。1947年以来,日本对英属东南亚地区的出口逐年上升,挤占了英国本土制造业的市场份额。以英国引以为傲的棉纺织业为例,1950年至1954年,日本就取代英国,成为香港、印尼、马来亚、缅甸等市场棉纺织品最大的进口来源。^④更让英国方面焦虑的是,日本的经济扩张背后有来自美国的全力支持。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在1950年通过的政策文件显示,这一时期,美国方面对使东南亚“成为日本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并借此抵抗社会主义阵营在该地区的渗透有着浓厚的兴趣。^⑤英国政商两界内部也对美日在东南亚地区的协调有所认识。早在1950年,英国棉业委员会(Cotton Board)访日代表团就在发往英国贸易部的秘密备忘录中,指出日本的棉业在东南亚的快速扩张,主要是由于美国“出

于对遏制共产主义极其强烈的愿望”。在英国产业领袖们看来,美国计划用日本生产的廉价产品大量供给地区国家,从而防止其因为较低的生活水平而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温床。^⑥美国对日本蚕食英国市场的纵容自然引发了英方的不满和外交反制。如1951年7月,美日两国代表组成了联合调查团,前往包括英国殖民地在内的东南亚地区,调查东南亚对日本经济可能的促进作用。由于事先没有与英国通气,英国外交部就该调查团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了正式抗议,而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更是直接拒绝该调查团中的日本代表进入香港。^⑦

然而,尽管英国方面对于日美两国觊觎英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感到不满,但英国国力的下降使它在抵抗日本经济扩张的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这一看法在英国驻东南亚殖民地的官员中非常普遍。1951年11月,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德(Malcom MacDonald)组织东南亚各英国殖民地官员在其位于新加坡的官邸中进行了会晤。^⑧与会的殖民地官员达成共识,认定虽然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受到美国支持,但英国由于在恢复本国经济以及维护英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等问题上需要美国的帮助,故而无法通过对美交涉来迫使美方放弃扶持日本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活动将持续对英国利益造成重大损害。^⑨换言之,英国殖民地官员悲观地认为,为了维护自身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地缘利益,美国将会牺牲盟友英国在其亚洲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而英国甚至难以做出有效的抗议。

同时,日方的活动也加重了英方的不安。对于坚持对美追随政策的吉田茂内阁而言,只要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扩张表示支持,日本就可以在这一问题上无所顾忌地向英方展现更加强硬的态度。^⑩1952年11月,吉田茂在其对日本国会的施政演讲中,公开宣称将扩展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作为内阁的优先目标。吉田还含蓄地抨击了英国对日本的不合作态度,表示“为了共同发展世界经济,日本期待其他国家与我国积极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共

存与互惠的原则之上”。^①日本的这种态度,不仅使得英国方面产生不满,也让与英国关系深厚的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经济扩张政策心怀疑虑。1952年英国驻东南亚各地的使领馆和高级专员发往本国的报告就常常提及本地区国家如缅甸、印尼、马来亚联邦等,对日本具有侵略性的经济活动抱有戒心和反感。^②这种情绪也为英国采取外交手段,限制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提供了重要基础。

为了限制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英国一方面创立英联邦内部的合作框架,如专注于技术和经济合作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另一方面也积极利用其在英联邦中的影响力,对日本加入各类经济合作组织的外交努力进行抵制。早在1951年11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就在其发给麦克唐纳德的电报中,指出由于“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将会深远地削弱英国的贸易利益”,英国已经决定搁置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的请求。^③从1951年到1954年,日本方面数次提出加入科伦坡计划,均被英国与澳大利亚以强硬态度否决。^④同时,英国也积极与英联邦国家进行外交协调,持续干扰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从1948年开始,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提案就一直遭到英联邦国家的否决。^⑤这与同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联邦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早在1951年,联邦德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就获得通过,而日本则直到1958年才在美国的外交斡旋下得以加入。^⑥自然,英国牵头的外交围堵使日本官员们感到十分失望。在日方看来,日本在东南亚国家受到的冷落,并非源于地区国家缺乏增强与日本经济联系的愿望,而是源于英国刻意为其制造的“外交难题”。日本外务省官员在对东南亚地区局势的评估中,就认为英国“对于任何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尤其是来自日本与西德的——极为敏感”。^⑦日本如果要继续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就必须“解决这些国家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所导致的政治问题”。^⑧可以说,由于激烈的经贸摩擦,英日双方内部都存在将对方视为地区政治中主要对手的声音。

二、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与英日在对华遏制问题上的探索(1952-1954)

这一时期,尽管英日两国内部都有视对方为对手的论调,但两国官员中也存在着试图协调两国利益的声音,英国决策层内部并未在对日政策上取得一致。相比于外交部和贸易部的官员,部分英国驻亚洲的高级外交官,如麦克唐纳德以及驻日大使艾斯勒·德宁(Esler Denning),倾向于对日本保持更加温和的立场。早在1951年,麦克唐纳德就建议英国政府重新评估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及其对英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在麦克唐纳德看来,由于日本工业生产成本逐渐提高,日本产业界对英国的威胁不过是“无法证实的幻想”。^⑨麦克唐纳德的意见遭到了英国外交部内包括艾登和亚洲部门顾问查尔斯·约翰斯顿(Charles Johnston)在内的强硬派的激烈反驳,英国政府内部关于对日外交的争论却并未在1951年结束。^⑩而麦克唐纳德于1952年6月对日本的访问,更成了日后英国政府内部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议,逐渐在外交上尝试缓和关系并进行合作的重要节点。

作为英国政府内部长期管理殖民地事务的官员,麦克唐纳德本人对于日本在东南亚的野心和其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有着清醒认识。自1950年起,他就一直试图与艾登领导下的英国外交部沟通,寻求英日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缓和乃至合作。同时,作为英国本土政府派驻东南亚的最高代表,麦克唐纳德也十分了解英属殖民地内华侨群体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并对中国利用该群体影响英国殖民利益的可能性抱有警戒态度。^⑪麦克唐纳德对华侨群体的担忧,也与新中国因抗美援朝战争而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影响力逐步上升有着直接关系。随着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表现以及日内瓦会议上获得的关于中南半岛的外交胜利,东南亚华侨群体对新中国的认同感也不断增强。^⑫从1952年开始,英国在东南亚以及香港的情报机构就本地华商与中国之间不断升温的贸易关系撰写了大量报告。^⑬英国官员认为,由于新中国在英国殖民地中的影响力逐渐压过蒋介石当局,本地华人将会主动地为中国的商业

与政治活动提供便利。如表1所示,新中国与东南亚以英镑为主要外汇储备国家间的贸易,在1950年代取得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与这些地区爱国华商积极向新中国靠拢的趋势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侨商从包括华润公司在内的渠道进口国货,同时在地区市场上作为代理商大量承销中国商品。^②同时,侨商网络也成为了新中国重要的商业情报来源。^③美国外交行动协调委员会于1957年发布的对东南亚华侨政策指导文件显示,东南亚华侨商人在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攻势”中起到了重要的中间渠道作用。^④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德为日本对抗中国影响力,维护英国殖民利益的作用进行辩护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他看来,如果英国从实力角度出发,不能阻止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扩张,那么就应该积极利用该国的经济实力为英国在本地区的殖民利益服务。具体而言,一个繁荣发展的日本,将会为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提供便宜的消费品,从而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防止中国通过经贸活动进一步加深影响力。^⑤这一论调不仅在部分英国殖民地高级官员中获得了拥趸,也在日后对外交部与殖民部中的部分对华强硬派中产生了影响,让后者认识到日本可能为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体系提供利益,从而为英国的外交转向提供了基础。

然而,当麦克唐纳德于1952年5月向本国和日本政府两方通报其于6月底访问日本的计划时,双方政府都对这次访问做出了对抗大于妥协的评估。英国殖民部在发给麦克唐纳德的电报中,就指出他们希望麦克唐纳德告诫日方“学会如何进行国际合

作”。^⑥日本方面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悲观态度。在外务省为首相吉田茂准备的会谈资料中,英日关系就被定义为“由于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冲突而充满对立与竞争的关系”。^⑦然而,与本国强硬派的悲观态度相反,麦克唐纳德与吉田茂本人都未将本次访问视为展示强硬态度的角斗场。当麦克唐纳德于1952年6月底正式访问日本时,他就惊讶地发现日本政府并未试图以此为契机在正式会谈场合向英方就贸易摩擦表达看法。相反,吉田茂政府仅仅安排日本企业界代表在非正式的招待会上要求英方减少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济活动的限制。^⑧这与日本政府在1950至1951年间展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面对日方淡化两国经贸冲突的做法,麦克唐纳德也投桃报李,在与日本企业界代表的会晤中释放了善意。面对日本商界代表的提议,他表示理解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对双方“所具有的绝对不可或缺的重要性”。^⑨在结束访问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甚至直接表达了个人对日本企业扩展在东南亚经济活动的欢迎。^⑩麦克唐纳德的这一表态也受到了日本媒体的追捧,并被视为英国可能将于近期转变态度的一个信号。

吉田政府一方面淡化两国在东南亚问题上的经贸摩擦,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求两国在地区外交上的协调,试图通过政治合作来淡化两国在经贸利益上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吉田政府选择将对华政策作为与麦克唐纳德谈判中最为核心的话题。在外务省为首相吉田茂与外相冈崎胜男准备的两份会谈文件中,日方就将重心放在了解英国决策层对华的态

表1 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地区)贸易额统计(1952-1958) 单位:100万美元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缅甸	马来亚/新加坡
1952年	236.3	1.9	0	39.4
1953年	244.5	2.1	3.2	36.1
1954年	189.5	3.5	2.2	34.9
1955年	213.5	16.7	37.3	42.0
1956年	205.5	42.9	37.3	50.9
1957年	219.6	53.3	21.6	76.4
1958年	271.8	85.2	19.6	102.0

资料来源:赤谷源一“共產圏諸国の低開発諸国に対する経済進出”、“外務省調査月報”二號、1960年5月號、135-136頁。

度,以及日本是否可能与英国合作,从而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上。^③在吉田政府看来,既然英日两国在经贸问题上的摩擦难以在短期内解决,那么通过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合作来改善英日关系,就成为了最合理的选择。然而,麦克唐纳德却并未如吉田茂所预想的那样,积极回应日本在对华问题上的提议。在与冈田外相的电话会谈中,麦克唐纳德对冈田提出的两国合作遏制中国问题的提案避而不谈,并在7月10日与吉田茂的正式会谈中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点。在会谈过程中,吉田提议应当在东亚建立一个以“伦敦、东京、华盛顿为轴心的安全联盟”,而麦克唐纳德和德宁则告诫日方应当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不应当低估中央人民政府对达到自身战略目的的决心”。^④英方展现出的冷淡态度使吉田无法在对华遏制问题上与英方取得一致,不得不搁置提案。

那么,如果英日两国无法在对华外交上取得一致,为何麦克唐纳德在访问后仍然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容忍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并寻求缓和关系的建议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麦克唐纳德试图遏制新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从而防止其对英国殖民利益造成威胁。如前文所述,麦克唐纳德对新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东南亚殖民地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中影响力上升的态势抱有担忧。鉴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经济影响力,英方并不乐见日本在对华问题上采取更加中立化的态度。

英方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1950年代早期,虽然吉田内阁采取了积极追随美国对华围堵的外交政策,但民间乃至政府内部对于同中国展开经贸交流的呼声一直存在。具体来说,当时日本产业界仍然对来自中国的包括煤炭、大豆、铁矿石在内的工业原料存在需求。^⑤在其盟国看来,日本对于中国原料的需求是影响日本外交立场的潜在隐患。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评估中,美国就认为必须“通过鼓励日本发展与自由国家的贸易”来防止日本“重新依赖来自中国与其他共产国家的原料和粮食”。^⑥然而,来自日本产业界的需求也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

激烈化,转化为了政商两界呼吁推进对华经济关系的政治运动。在1949年到1952年间,有二十多个致力于打破日中贸易壁垒的经济团体成立,包括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日中贸易振兴会和以大企业为主的日中贸易协会。^⑦这一来自日本商界的对华贸易热潮也给驻日英国外交官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驻日大使德宁于1952年指出,哪怕美国决策层已经认识到日本对华贸易的危险,这种需求也很难被遏制:“当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本将会尽其所能开展对华贸易。即使美国不允许它公开地这么做,日本也一定会秘密地进行。”^⑧同时,日本的半官方经济机构也积极展开声援。时任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的藤山爱一郎就在1952年3月的一场演讲中公开表达了对吉田政府贸易政策的怀疑,认为吉田政府目前采取的“从美元圈进口,向英镑圈出口”的外贸政策已然失败。为了达成日本经济的真正“自立化”,政府必须对外贸政策“采取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调整”。^⑨

在产业界之外,日本政界也存在对吉田内阁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非独立外交政策的反对意见。在国会中,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以及自由党中以鸠山一郎为首的反吉田派尽管政见不一,却不约而同地利用产业界对吉田内阁的不满向政府发难,使得吉田茂不得不在1952至1954年间三次解散国会,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动荡。^⑩同时,在日本国会中,不同党派的议员也联合起来,在左派自由党议员池田正之辅与社会党议员帆足计的倡议下,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⑪仅在1953年,该联盟就通过了两份要求政府拿出切实努力,改善对华贸易状况的议案,并在吉田政府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节活动。^⑫值得注意的是,扩展对华贸易的意见不仅存在于国会中,也存在于包括外务省以及通商产业省在内的具体执行政府决策的官僚机构之中。以通商产业省为例,该部门官僚就分裂为支持吉田对美追随政策的“外交派”和反对吉田的“统制派”两个群体。^⑬对于后者而言,为了重建日本独立的产业政策,就必须改变日本对美国经济的捆绑,并借此让日本的原料来源多元化。吉田茂本人对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论调极为

反感,认为这会让日本在其盟友中的外交形象受到极大损害。^④然而,这一论调受到产业界巨头的支持。这一群体也在1954年岸信介和鸠山一郎迫使吉田下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⑤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政府内部尤其是经济官僚集团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部分心思活络的日本商人也开始借着这个机会,与部分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合作,有限度地尝试对华贸易。如后文将提到的,这些举动甚至获得了来自英国政府的默许乃至支持,并成为日英两国在这一时期展开合作的另一突破口。可以说,日本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声音,与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愈加剧烈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得西方阵营内部决策层不约而同地做出了若吉田政府倒台,日本将有可能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中立化政策的评估。

这一论调自然引起了英国方面的关切。1952年6月,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蓝来讷(Lionel Lamb)就其发往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表达了担忧。在他看来,日本在贸易问题上所遭遇的来自英国牵头的孤立,以及在与欧洲诸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遭受的歧视性待遇,将使其更加倾向于同中国达成妥协。^⑥同样,作为英国政府内部对日友好的主要倡议者,麦克唐纳德在访问东京时十分关注日本内部的这场政治风波,并对吉田内阁是否能够承受来自政府与产业界的联合施压感到怀疑。在7月15日结束与吉田的私人宴会后,麦克唐纳德向德宁传达了由于政府未能回应对华贸易的诉求而招致的大量批评,吉田茂个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面临了极为巨大的压力”。^⑦对于吉田茂的观察也成为麦克唐纳德最终向英国外交部提出对日亲善建议的依据。在他看来,由于吉田政府最终将迫于压力缓和对华关系,为了防止日本对中国市场产生依赖,英国应当对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抱有更加开放的态度。“由于有着将日本留在反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强烈需求”,麦克唐纳德在其于7月26日发给艾登的电报中写道:“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调整为与日本重新建立尽可能友好和信赖的关系。”^⑧

麦克唐纳德、蓝来讷等人对日友好的论调确实

在英国政府内部获得了一定支持,但这种支持仍然显得有些勉强。在英国外交部看来,一方面,英国缺乏遏制日本在东南亚扩张经济的实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英国必须与日本和解,并共同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英国外交部通过内部讨论得出的结论,显示由于缺乏美国的支持,英国无法对日本在东南亚的活动作出限制。同时,出于对“共产主义阵营和平攻势的担忧”,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对日本展现出一种“不温不火,充满怀疑和担忧的友谊”。^⑨最终,尽管英国贸易部表达了反对,丘吉尔内阁仍然接受外交部的建议,放弃了对日本参与英国主导的地区经济合作框架的抵制,从而缓和双方的关系。从1952年底开始,英国不再积极反对日本参与包括科伦坡计划在内的地区经济组织,并且表示只要日本能够获得科伦坡计划中亚洲各国的支持,英国就会对日本的加盟秉持欢迎的态度。^⑩尽管日方仍然对英国暧昧的态度有些不满,但英国的态度转变在事实上消除了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并借此扩大其在东南亚经济影响力的最大阻力,日本成功地于1954年渥太华会议上成为科伦坡计划的正式成员国。^⑪

英国试图借日本对抗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做法取得了部分成功。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双管齐下,通过贸易和技术援助不断加深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并于1957年岸信介上台后,试图联合地区国家限制中国出口,从而打击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⑫对于这一点,中国方面也不甘示弱,号召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并通过有针对性限制商品价格的做法打击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出口。^⑬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势头也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而遭到破坏,并于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后跌到最低谷,直到1962年两国通过备忘录后贸易才得到部分恢复。

三、英日在扩展对华贸易上的合作(1952-1957)

1950年代早期英国与日本的合作,除了与防止日本缓和中日关系的考虑息息相关外,也与两国在扩展对华贸易上的相似利益有关。同日本一样,英国政商两界也存在对华贸易需求。早在1952年4

月,英国方面就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与冀朝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签订了贸易协定。^⑤根据该协定,英国商人将在1952年结束前向中国出口包括工业设备在内的价值1000万英镑的货物。^⑥两国于1954年进一步加深了经贸往来,分别派出贸易代表团进行互访。同时,由于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商人对于对华贸易的依赖,以及香港本地大量专精于对华贸易的洋行对港英政府的影响力,英国对于拓展对华贸易以及提高香港在亚洲地区贸易中的地位,都抱有浓厚的兴趣。

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对于日本通过香港与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往往抱有一种谨慎而乐见其成的态度。1952年1月,英国帝国化学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就向英国政府报告,该公司与中方在香港的商业代表进行了接触,计划直接代理或是在金融方面参与中日之间由中方出口煤炭与工业用盐换取日本化学品和肥料的贸易。^⑦英国政府内部对这一报告看法不一,包括殖民部、贸易部及财政部在内的政府机构都表示支持,而英国驻华盛顿和东京的使馆则出于对美国反应的担忧表示了反对。最终,英国政府内部达成一个折中方案。1952年2月,英国外交部门向帝国化学公司转达了其最终决定,不支持该公司作为中方代理人直接参与中日间的贸易,但并不反对其为任何中日间达成的贸易协定提供包括金融在内的一切服务。同时,英国政府也对这一决定严格保密,并不会向华盛顿方面透露任何与交易相关的信息。^⑧同时,英国政府内部也通过政策协调为英国公司参与中日民间贸易提供支持。譬如1952年,英国财政部就通过备忘录指示香港方面绕过对华禁运的规定,为中日之间以英镑结算的棉纺织品贸易提供信用证方面的便利。^⑨

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经济官僚集团内部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许多受到大财阀支持的贸易公司,也开始与政府内部的反吉田派官僚合作推进对华贸易。这种贸易本身也受到了英国当局的默许乃至支持。中日两国在1950年代经由香港完成的第一笔民间易货贸易,就生动诠释了英日两方在对华贸易上的默契。在这一贸易中,日本启明交易

会社和香港的英资银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启明交易会社的前身为战前由三菱等旧财阀出资设立的开滦煤炭贩卖株式会社,在战后因与旧财阀的关系而被盟军占领当局取缔。^⑩但在1946年,该公司又以独立的民间贸易公司的名义重建,并仍与日本政商界保持着紧密联系——公司重建后的首任社长菅波称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担任日本商工省的高级官僚,公司本身也主要依赖包括日本制铁、日本钢管、东京瓦斯、大阪瓦斯、三菱化学五家与日本旧财阀有着直接继承关系的工业巨头的注资。^⑪因此,该公司在香港与中国的接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商两界高层的共识。

当香川峻一郎^⑫于1952年1月秘密飞往香港与中方代表接触时,他首先与香港总督办公厅以及在香港长期进行对华贸易的英国天祥洋行(House of Dodswell)洽谈。根据香港总督葛量洪的报告,香川希望把香港作为中日贸易的转运港,并要求利用香港银行为可能达成的交易提供金融服务。虽然港英政府方面由于担忧美国在对华禁运上的态度,并未批准香港作为转运港的请求,但却给予了英国公司和银行为中日交易提供金融服务的许可。^⑬随后,香川与中国在香港的贸易代表进行了接触,并获得前往北京进行进一步洽谈的邀请。^⑭当香川一行4人飞往北京时,他们受到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冀朝鼎的接待,双方就可能进行的贸易进行了商谈。^⑮通过长达半年的交涉,启明交易会社最终与中方达成协议。仅在1953年,中国就将向日本出口价值700万英镑的煤炭,以换取日本出口的纺织设备和采矿机械。^⑯这一贸易由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分行与汇丰银行共同提供金融服务。^⑰同时,该协议还包含一个秘密条款,即日方将通过外交斡旋,向中方提供被美国列为禁运物资的镀锌钢板,以向中方换取额外的煤炭配额。^⑱这一交易最终于1955年通过日本通产省对美斡旋得以成立。可以说,启明交易会社之所以能够在中日英三方参与的贸易中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并最终达成对华贸易,与这一时期英日两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存在的默契是分不开的。

除了英国方面主动向日本对华贸易提供的便利,吉田内阁同样也意识到了与英国进行协调,从而在对华贸易上获得进展的可能。1954年初,吉田茂迫于国内政界与商界的巨大压力,开始尝试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以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吉田采取了先英后美的外交策略。1954年10月,吉田在11月访美前先对英国进行了访问。在与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中,吉田反复建议日英两国应该在外交上进行协调,并联合向美方施压以换取其在对华禁运问题上的让步。^⑥艾登尽管因担心美方反应并未附和吉田的提议,但仍然指示英国驻美使馆向美方“委婉地”表达英国希望放松对华禁运的愿望。^⑦然而,当吉田试图与美方就对华禁运问题进行沟通时,美方态度却因西方阵营在朝鲜和越南问题上的失利而愈发坚决。在日方提交给美方的会谈文件中,日方向美方表达了“在不打破现有禁运体系的情况下,日本希望扩大与中国关于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并获得美方谅解”的愿望。^⑧然而,在吉田与艾森豪威尔及杜勒斯进行的三次会谈中,美方不仅没有对日方要求作出回应,反而再次向日方强调“自由世界”国家“必须以坚定的态度联合起来,防止被共产主义国家各个击破”。^⑨杜勒斯甚至在日方准备的美日联合声明草稿中,强行删去了日本希望放松对华禁运、扩展对华贸易的部分。^⑩在结束这次访问后不久,吉田就黯然下台,将政权交给了其反对者鸠山一郎。

日英两国在对华贸易上的外交协调并未随着吉田茂下台而终止。鸠山一郎在接手政权后,就提出了与共产主义阵营缓和、让日本成为“东西之窗”的外交理念。^⑪在他的授意下,日方不顾美国反对,派遣由时任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并与周恩来、廖承志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随着中日关系在鸠山任内逐步升温,两国进行了包括农业技术在内的各种经济技术合作,并通过日中两国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大大增加了贸易往来。与此同时,英日两国也展开了紧密的外交协调。英国艾登内阁与日本鸠山内阁在对华禁运问题上紧密协调,以不再遵从所谓“中国委员会”(CHIN-

COM)的禁运清单为筹码,促使美国艾森豪威尔政权为维持对共产主义阵营的禁运,于1954年至1956年间逐渐缩小对华禁运的范围。^⑫1957年,两国又以英国牵头、日本跟随的方式,同时宣布不再严格遵守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框架下所谓的“中国清单”(China Differential),并开始向中国出口允许向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的各种物资。英日的态度迫使美国不得不于同年8月追认两国的做法,从而独自一国坚持对华的严格禁运。^⑬也标志着英日两国在外交上的协调达到了1950年代的最高峰。进入1960年代后,英日双方尽管在印度尼西亚局势上发生了新的争执,但仍然通过两国间定期协议会议等渠道保持了密切沟通,并将两国关系总体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框架内。

结论

通过1950年代早期英日两国从对抗走向部分合作的过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因素对两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影响。英日双方都在双边外交的决策过程中,将对华关系作为两国外交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对于英国而言,由于东南亚存在庞大的华侨群体,英方时时感受到中国对其殖民利益的威胁。随着中国通过“一五”计划取得经济发展,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胜利,这种威胁变得更加紧迫,以致让部分决策者为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而放弃与日本在经贸问题上的斗争,转而对日本在该地区攫取经济影响力的活动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也成为其对英国外交的重要筹码。吉田政府试图通过协调对华立场,转移英方对英日两国在东南亚经贸利益冲突的关注。同时,英日两国对对华贸易的考虑,也为两国部分政商界人士在具体经贸事务上展开合作,以及通过外交协调挑战美国对华禁运提供了基础。

中国在英日两国外交决策的过程中,不仅仅作为假想敌出现,同时也通过对华贸易这一议题,为两国提供了在共同的经济利益上展开合作的契机。这一共同利益最终驱使英日两国在1950年代通过私下的默契与合作,共同推进对华贸易,并在这一过程中满足本国产业团体的商业利益。同时,由于美国在

对华贸易上的强硬态度,英日两国在扩展对华贸易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做法,并不直接通过政府推进项目,而是通过与政府有着紧密联系的贸易公司来投石问路,从而逐步推进自身的外交战略。这也为我们研究冷战时期外交决策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即通过政府支持的民间活动,来还原各国政府制定的外交战略。可以说,通过研究民间与官方的密切互动,学界将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冷战中,国家出于竞争的目的,对本国各种资源的动员和利用,进而思考冷战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军事斗争之外所呈现的广阔图景。

注释:

①对于这一时期的英日外交合作,参见 Warren I. Cohen. "China in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Iriye Akira and Warren I. Co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 pp. 36-60.

②对于英日两国在冷战早期安全问题上的互动以及合作,以木畑洋一与渡边昭一的研究为代表。前者认为英国对日本战后向东南亚开发极为警惕,这是源自其“帝国心态”,即认为英国对其殖民地与保护领地区的影响力是英国作为大国存续的必要条件。后者认为英日两国为了防止前殖民地地区因为经济动荡而转向共产主义,不得不在经济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在科伦坡计划框架下继续进行一定合作。详见木畑洋一“帝国のたそがれ:冷戦下のイギリスと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渡边昭一“コロンボ・プラン—戦後アジア国際秩序の形成”、法政大学出版局、2014年。

③对于英日这一时期的经济纠纷,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横井则子以及都丸润子。横井的研究主要关注英日之间的英镑外汇问题,主要阐述了英国对日本的妥协。而都丸则着眼于20世纪40-60年代英日之间在作为英帝国殖民核心的马来亚问题上的交锋,认为日英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在冷战中经历了从对抗到合流的过程,日本希望通过与英国合作,对抗美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巨大影响力,而英国殖民部的官员则试图利用与日本的合作来维持英国在前殖民地地区的影响力和商业利益。详见 Yokoi Noriko, *Japan's Postwar Economic Recovery and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1948-62*,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Junko Tomaru, *Postwar Rapprochement of Malaya and Japan, 1945-61*,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同时,清水小百合也在其关于1950年代日美经济关系

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详见 Shimizu Sayuri, *Creating People of Plen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Economic Alternatives, 1950-1960*,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Bernice M. Hornbeck, *Communist China's Cotton Textile Exports: Their Growth, and Their Effect on World Markets*, Washington D. C: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59, pp. 18-21.

⑤Tracy S. Voorhees, "NSC Policy Paper in Asia," 10 January, 1950, in "Far Eastern Areas, U. S. Economic Aid to.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NSC 61." NSC Files, Textual Archives Services Division (NWCT),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D.

⑥Cotton Board, "CB 8332a: Confidential Memorandum o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U. K. Cotton Industry," May 1950, J 1331/33, FO 371/83898,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p. 94-95.

⑦Alexander Grantham, "Telegram 199, From Governor, Hong Kong, To Con. Gen. Singapore. 213," July 20 1951, HKRS No. 163, D-S No. 1-1430,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⑧麦克唐纳德位于新加坡的官邸为武吉士林(Bukit Serene)王宫,为前柔佛苏丹的王宫。而他所召集的东南亚地区英国殖民官员的会议也以这座宫殿命名。在其任期内,该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用以商讨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政策。参见 John Weste, "Facing the Unavoidable—Great Britain, the Sterling Area and Japan: Economic and Trading Relations 1950-60," in Janet Hunter, Shinya Sugiyama eds., *The History of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1600-2000: Volume IV: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lation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310。

⑨Malcom MacDonald, "No. 193(Saving): Bukit Serene Conference: Japan," 28 November 1951, FJ 1127/18, FO 371/9264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102.

⑩Shimizu Sayuri, *Creating People of Plen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Economic Alternatives, 1950-1960*, p. 82.

⑪"Prime Minister's Administrative Speech," 24 November 1952, FJ 1022/32, FO 371/994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167.

⑫关于东南亚地区国家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济活动的态度的报告,可见 Derwent William Kermode, "Telegram No. 121

(1077/2/52), from Mr. D. W. Kermode to Mr. Eden," 10 June 1952, FJ 1022/15, FO 371/994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p. 89–93; Basil Boothby, "Comments on the Burmese Attitude towards Japan." 14 June 1952, FJ 1022/16, FO 371/994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p. 95–96.

⑬Anthony Eden, "Future Japanese Relations with Asia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6 November 1951, FJ 1127/17, FO 371/9264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91.

⑭外務省アジア局第一課‘わが国のコロポ計画加入問題’、1954年9月24日、‘コロポ・プラン関係 日本の加入関係’、管理番号E’4.1.0.1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58–59頁。

⑮ 参见 Shimizu Sayuri, *Creating People of Plen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Economic Alternatives, 1950–1960*, pp. 29–39.

⑯赤根谷達雄：‘占領下日独に対する最恵国待遇供与問題’、‘国際政治’1995年6號、163–179頁。

⑰外務省アジア局第四課‘東南アジア国際情勢の分析’、1953年3月、管理番号A’4.1.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2頁。

⑱外務省アジア局第四課‘東南アジア国際情勢の分析’、1953年3月、管理番号A’4.1.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8頁。

⑲Malcom Macdonald, "Future Japanese Relations with Asia,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3 October, 1951. FJ 1127/14, FO 371/9264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47; Eden, Anthony, "Future Japanese Relations with Asia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6 November 1951, FJ 1127/17, FO 371/9264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p. 90–91.

⑳ Charles Hepburn Johnston, "Minutes, Japan'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S. E. Asia," 6 November 1951, FJ 1127/17, FO 371/9264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73.

㉑1950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人数虽然未有准确的统计,但各方估计的数目相差并不大,大致在900万至1100万之间。根据美方估计,截至1957年,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口为1013万上下。而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南洋地区的华人华侨人口为1173万上下。详见 State Department, "U. S.

Policies and Current Actions Toward Overseas Chinese of the Governments in Southeast Asia," 6 September, 1956,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CK2349005672, GALE Digital Archive; 华侨问题委员会:《亚非地区华侨情况介绍》,华侨问题研究会,1955年,第6–7页。

㉒华润公司联络部:《通过业务配合华商统战工作的汇报》,1955年9月15日,吴学先:《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3页。

㉓Local Intelligence Committee (L. I. C), Hong Kong. "L. I. C.(H. K.)3/56: The Vulnerability of Hong Kong to Non-Military Aggression." December 1956, ISD 105/68/02, CO 10357/78, in HKRS No. 183–1,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㉔具体来说,华侨商人在香港购入中国商品的时候,往往会获得华润公司帮助。如泰国的华侨商人在香港往往通过华润牵线,利用友好商行(如五丰行和德信行)的担保办理信用证以及优惠条件的贷款,进口中国产品并运往所在国进行销售。关于这一情况,可见 Richard Whittington, "Increase in the Volume of Imports into Thailand of Certain Goods Manufactured in Communist China," 7 August, 1958, FC 11340/3, FO 371/13340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㉕Economic Survey Section, Hong Kong. "Confidential No. 063/57/A. 56, To P. C. F Dalton Esq.,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14 October, 1957, FC 1122/22, FO 371/12732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㉖Operation Coordinating Board, "OCB 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cember 11, 1957, OCB Files, Lot 62, D 430, Box 28,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College Park, MD. p. 3.

㉗Malcom MacDonald, "Note on Japan," 26 July, 1952, FJ 1633/25G, FO 371/99506,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170.

㉘J. A. Pilcher. "Confidential: Proposed Visit by the Commissioner General for the United Kingdom in South East Asia to Japan," 14 May 1952, FJ 1633/2, FO 371/99506,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18.

㉙‘総理、マクドナルド会見の際の参考資料’、1952年6月27日、‘英国要人本邦訪問関係マクドナルド東南アジア総弁務官関係’、管理番号A’1.6.4.5–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6 頁。

③⑩ "Summary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Mr. MacDonald and a Group of Japanese Industrialists," 3 July 1952, FJ 1633/22, FO 371/99506, TNA, pp. 137-139; 欧米局第三課‘マクドナルド総弁務官に会見する実業家’1952年7月1日、“英国要人本邦訪問関係マクドナルド東南アジア総弁務官関係”、管理番号 E’1’1’6’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⑪ 参与会见的日方商界代表主要来自日本的大企业和财团,包括日本造船、日本化学、东京芝浦电机,以及日本开发银行。同时,日后在鸠山一郎内阁任经济审议厅长官的高崎达之助也作为东京制铁的代表出席了该次会见。关于会见的日方资料和英方资料,参见 "Summary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Mr. MacDonald and a group of Japanese industrialists," 3 July 1952, FJ 1633/22, FO 371/99506, TNA, pp. 137-139; 欧米局第三課‘マクドナルド総弁務官に会見する実業家’、1952年7月1日、“英国要人本邦訪問関係マクドナルド東南アジア総弁務官関係”、管理番号 E’1’1’6’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⑫ "McDonald Sees Increased Trade: U. K Commissioner-General for S. E. Asia Stresses Economic Tieup," 9 July 1952, Japan Times, p. 1.

③⑬ ‘外相マクドナルド会談参考資料’、1952年6月29日、“英国要人本邦訪問関係マクドナルド東南アジア総弁務官関係”、管理番号 A’1.6.4.5-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0-17 頁。

③⑭ Esler Denning, "Japanese Policy in the Far East: Conversation between Her Majesty's Ambassador, Mr. McDonald, and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10 July 1952, FJ 1633/24, FO 371/99506, TNA, pp. 149-150.

③⑮ 李豊‘貿易促進団体の誕生と戦後日中関係の始まり’、“現代中国研究”30 號、2012 年、44 頁。

③⑯ "Statement of Policy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Japan," 7 August 1952, NSC 125/2, S/S- NSC files, Lot 63, D 351, NSC 125 Series. Reprinted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1954, China And Japan, Volume XIV, PART 2, pp. 1304-1305.

③⑰ 参见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125 頁。

③⑱ Esler Denning, "Telegram No. 168, Japan China Trade," 4 February 1952, FC 11323/12, FO 371/9931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p. 50-51.

③⑲ 藤山愛一郎‘自立経済の苦悶を語る’、“Chamber”26

期、1952年3月號、5-6 頁。

④⑩ See John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 19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④⑪ 波多野勝・飯森明子・清水麗編“日中友好議員連盟関係資料: 帆足計・中尾和夫文書一資料編”、現代史料出版、2002 年、19-25 頁。

④⑫ 解建群等编著《贸促春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史(1952-199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1995 年,第68-70 頁。

④⑬ 外交派以时任通商产业省官房长官的永山时雄以及贸易厅长官白洲次郎为首,支持吉田内阁采取的加强日美经济联系,反对扩展对华贸易以防止对美关系遭受损害。而统制派则以日本战时的工商省官僚为主,支持日本重建独立的工业体系,进而一定程度上恢复日本战败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这些官僚以岸信介与椎名悦三郎为领袖,支持前者反对吉田茂内阁的立场。详见松本清張“現代官僚論”、文藝春秋新社、1963 年。

④⑭ 河野康子‘吉田外交と国内政治一通産省設置から電力借款導入まで’、“日本政治学会年報”1991 年号、29-52 頁。

④⑮ ‘財界話: 田現内閣を支持しない’、“ダイヤモンド: 経済雑誌”48 號、1954 年12 月號、38-40 頁。

④⑯ Lionel Lamb, "Telegram No. 139, Attitud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Towards Japan," 17 June 1952, FJ 1022/20, FO 371/994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p. 109-110.

④⑰ Esler Denning, "JAPANESE POLICY IN THE FAR EAST. Conversation between Her Majesty's Ambassador, Mr. McDonald, and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15 July 1952, FJ 1633/24, F 0371/99506, p. 149.

④⑱ Malcom MacDonald, "Note on Japan," 26 July, 1952, FJ 1633/25G, FO 371/99506,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166.

④⑲ Pilcher, John, "Minutes: Mr. McDonald's Impressions of Japan," 25 August 1952, FJ 1633/25/G(1498/83/52G), FO 371/99506, TNA, pp. 158-159.

④⑳ 外務省アジア局第一課‘わが国のコロポ計画参加に対する米国及び英連邦諸国の態度’、1953 年12 月28 日、“コロポ・プラン関係日本の加入関係”、管理番号 E’4.1.0.1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5-8 頁。

④㉑ Yokoi Noriko, *Japan's Postwar Economic Recovery and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1948-62*, p. 98.

⑤②大臣官房総務課“岸総理東南アジア諸国、オーストラリア、ニュー・ジーランド訪問関係 訪問国首脳との会談記録”、1957年12月1日、分類番号A'.1.5.1.5-3、史料管理番号100-0104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③对于抵制日货的做法，详见“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by Chinese, Enclosed Media Press Review. July 21,” 29 July 1958, FC 11323/1, FO 371/133399, TNA; 对于针对性调价的做法，详见《1958年纱布对资出口总结及1959年经营方案》，1958年12月10日，档案号B134-6-58-1，第7-8页，上海市档案馆藏；《关于日货在东南亚市场与我竞争等情况报请参考》，1956年2月2日，档案号B6-2-378-12，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④关于莫斯科经济会议以及中国代表团在该次会议中的活动，可见Липкин, М. А., “Москов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1952 г.: тактический маневр или нов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линия СССР,”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 2010: 52-64.

⑤⑤ “Text of Statement Mad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pril 22, 1952 by the Secretary for Overseas Trade,” 1952年4月22日、管理番号E'3.60B(1)/C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2-3頁。

⑤⑥ Alexander Grantham, “Telegram No. 26, Japan China Trade,” 9 January 1952, FC 11323/2, FO 371/9931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19.

⑤⑦ Hubert John Collar, “HD/91/HK, China/Japan Trade,” 8 January 1952, FC 11323/9, FO 371/99315, pp. 42-43; Esler Denning, “Telegram No. 168, Japan China Trade,” 4 February 1952, FC 11323/12, FO 371/9931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50.

⑤⑧ J. J. Cowperthwaite, “Memo: L. M. 7052(52). Barter Transac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inanced Through Hong Kong,” 17 September, 1952. HKRS No. 41, D—S No. 1-7303,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⑤⑨ ‘啓明交易’、‘社会人’1952年11月號、59頁。

⑥⑩ 堀内文二郎・望月勲“開港炭砵の80年”、啓明交易、1960年、125-126頁。

⑥⑪ 香川峻一郎时任啓明交易会社长，他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曾作为日本特高科驻汉口情报人员长期在华活动。

⑥⑫ Arthur Grantham, “Telegram No. 77: Japan China Trade,” 24 January 1952. FC 11323/6, FO 371/9931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63.

⑥⑬ Arthur Grantham, “Telegram No. 77: Japan China Trade,” 24 January 1952. FC 11323/6, FO 371/9931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63.

⑥⑭ 解建群等编著《贸促春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史（1952-1994）》，第66页。

⑥⑮ Arthur Grantham, “Telegram No. 1069: Japan China Trade,” 2 December 1952. FC 11323/33, FO 371/9931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 117.

⑥⑯ 堀内文二郎・望月勲“開港炭砵の80年”、132頁。

⑥⑰ 根据日美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将临时把镀锌钢板从禁运名单上移除，而日方则通过承诺限制给中方提供的钢板的厚度，来获得出口12000吨镀锌钢板的许可。见堀内文二郎・望月勲“開港炭砵の80年”、132頁。

⑥⑱ Anthony Eden,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t the Foreign Office on October 27, 1954,” 27 October 1954, FJ 1631/87, PREM 11/3852,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66.

⑥⑲ Anthony Eden, “Addressed to Washington telegram No. 5419 of October 29,” 29 October 1954, PREM 11/3852,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65.

⑦⑩ ‘Doc.No.102311, General Review of Japan’s Economy’、1954年11月8日、“吉田総理欧米訪問関係一件(1954.9)会談資料関係”、分類番号A'.1.5.0.3-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⑦⑪ ‘吉田総理、アイゼンハワー大統領会談要旨’、1954年11月9日、“吉田総理欧米訪問関係一件(1954.9)第5巻”、分類番号A'.1.5.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⑦⑫ Shimizu Sayuri, Creating People of Plen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Economic Alternatives, 1950-1960, pp. 74-75.

⑦⑬ 鳩山一郎‘施政方針演説第21会(常会)’、1955年1月22日、データベース‘世界と日本’、日本政治・国際関係データベース、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https://worldjpn.grips.ac.jp/documents/texts/pm/19550122.SWJ.html>，访问时间：2024年2月18日。

⑦⑭ Michael Schaller, 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0-95.

⑦⑮ Osamu Ishii, “China Trade Embargo and America’s Alliance Management in the 1950s—the Japanese Case,”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s, 20, 1992, pp. 23-31.